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镕 主编

应国青铜器卷

李树浪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应国青铜器卷

李树浪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应国青铜器卷 / 张懋镕主编; 李树浪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3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ISBN 978-7-03-055975-3

I. ①中…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2902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曹 伟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1/2 插页: 1

字数: 368 000

定价: 1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身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我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几万还是十几万（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盨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试论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

角度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她）来做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我与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做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们放大胆子去写，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与曹伟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谔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西周姬姓诸侯国青铜礼容器的比较研究（代序）

张懋镕

三十年前，李学勤先生在《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一文中指出：“过去只能讲东周时期列国青铜器的异同，现在则有条件探讨西周诸侯国青铜器的若干特点。”并认为：“诸侯国的青铜器很多和周王朝的器物相同，在器形、纹饰和工艺上都看不出明显的特点。”^①这是很中肯的结论。三十年来，随着大量西周诸侯国墓葬与青铜器的发现、国别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西周诸侯国青铜文化的认识也更为深入细致。李树浪博士所著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应国青铜器卷》^②，就是对西周时期姬姓诸侯国应国青铜礼器的专门研究。本文想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西周姬姓诸侯国在青铜礼器方面的差别，研究这种差异，对了解姬姓诸侯国的生存环境和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几个主要的姬姓诸侯国：北方的晋国、中原的应国、南方的曾国、东方的鲁国。考虑西周时期鲁国的青铜器墓发现很少，所以将春秋早期的鲁国青铜器墓也包含在研究范围内，以资参考。

在西周时期，大致存在三大族群：殷遗民、周人和土著（土著包括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等）^③。就文化属性而言，有殷商文化、周文化和土著文化。所谓西周姬姓诸侯国青铜文化的差异，往往就是他们（周人）受殷商文化和当地的土著文化影响的深浅程度。窃以为，衡量他们受影响的标尺有四个方面：青铜器出土环境的差异、青铜器类别的差异、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形式的差别以及日名和族徽问题。

一、青铜器出土环境的差异

内涵相近的青铜器，如果出土在不同的环境里，其性质可能会截然不同。譬如，

① 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28页。

② 李树浪：《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应国青铜器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本文凡引述该书观点，不再一一注明。

③ 张懋镕：《西周早期铜器墓的分类与族属——兼论“分器”现象》，《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347~349页。

同样是有族徽和日名的青铜器，出土在西周殷遗民的墓葬中（如鹿邑长子口墓），它可能就是墓主人的器物，对判断此墓的性质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出土在周人的墓葬里（如叶家山曾国墓地），它就不一定是墓主人的器物，对判断此墓的性质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有可能扰乱我们的视线，导致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讨论青铜器的差别，应该先从青铜器出土的环境差异谈起。

所谓青铜器的出土环境，即指青铜器所在墓葬的形制和葬式。在应、晋、鲁、曾四国中，以曾国的葬制与葬式最为特殊，与王畿地区的形式迥异。从叶家山曾国墓地布局来看，墓葬的方位大致是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①。同时期殷遗民和周人墓葬的方位大致是南北向，墓主人头朝北，而江汉土著的墓葬的方位大致是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同时，叶家山曾国墓地年代最早的M1还有腰坑。腰坑是殷商墓葬的主要表征之一，自先周以来，周人的墓葬基本不用腰坑。由此可见，叶家山曾国墓地的葬制与葬式受到土著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双重影响，情况非常复杂，无怪乎很多资深的研究者一开始都不认为叶家山曾国墓地的主人是姬姓诸侯国的贵族。^②

其次是晋国。在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出现殉人、殉狗现象。M114有殉人、殉狗^③，M9、M6、M91有殉狗^④。商代晚期殉人、殉狗现象很普遍，与腰坑一样，是殷商文化的表征。自先周以来，周人的墓葬基本不用殉人、殉狗。可见西周时期的晋国葬制与葬式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由于未见腰坑，况且殉人、殉狗的例子也不多，故晋国葬制与葬式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有限^⑤。

再次是应国。在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墓葬的方位大致是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足南，既无腰坑，也无殉人、殉狗，可见在葬制与葬式方面应国贵族与王畿地区的姬周贵族一致，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⑥。

鲁国比较特殊。据《曲阜鲁国故城》介绍，墓葬的方位大致是南北向，分为甲、

①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12页。

② 李学勤、李伯谦、朱凤瀚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64~77页；黄凤春：《关于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问题》，《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3年，5页。

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9、10页。

④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3~6页；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10页。

⑤ 张懋镛：《晋侯墓地文化解读三题》，《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70~72页。

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大象出版社，2012年，18、92、144、188、219页。

乙两组风格迥异的墓葬。前者有腰坑，绝大部分头向朝南，M202有殉人，有29座墓有殉狗，后者无腰坑，也无殉人、殉狗，多数头向北。前者是当地的土著，东夷人，后者是姬姓鲁国贵族。两组墓的葬制、葬式不同，壁垒分明^①。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姬姓诸侯国的墓地，葬制、葬式往往很难分清，而在鲁国，却是一目了然。这种区分，显然是要彰显姬姓鲁国贵族在维护周礼方面的纯正性。

总而言之，在墓葬的形制和葬式方面，曾国所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其次是晋国，再次是应国，最后是鲁国。

二、青铜器类别的差异

商周之际青铜器类别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传统酒器的减少，以爵、觚、觶、斝、方彝的变化最为明显。我们曾经对有铭文的爵、觚、觶、斝、方彝的数量变化做过统计。商代晚期爵、觚、觶、斝、方彝的数量分别占总数的71.9%、89.4%、49.2%、82.2%、73.5%；西周早期爵、觚、觶、斝、方彝的数量分别占总数的26.7%、10.6%、46%、16.8%、13.3%；西周中期爵、觚、觶、斝、方彝的数量分别占总数的1.3%、0%、4.8%、0%、13.3%^②。可见爵、觚、觶、斝、方彝在西周早中期之交迅速衰落或消亡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使用爵、觚、觶、斝、方彝者主要是殷遗民，周人较少使用。具体而言，不同等级的姬周贵族人使用爵、觚、觶、斝、方彝的情况也不一样。大致4平方米以下的小型墓葬以及中型偏小的墓葬出土鼎和簋，不出爵、觚和觶；中型偏大以及大型墓葬会出土爵、觚、觶、斝、方彝。但其中有些爵、觚、觶、斝、方彝乃“分器”及其他途径而来，并非墓主人所固有（详下）。中期之后，即使在中型偏大的姬周贵族墓葬中也几乎不使用爵、觚、觶；在大型姬周贵族墓葬中有使用爵、觚、觶、斝、方彝，但其中很多为明器。显然在西周时期，爵、觚、觶、斝、方彝是具有标志性的器物。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应、晋、鲁、曾四国青铜器中这些酒器的数量与质量来评判各自受殷商文化影响的程度。

先看应国。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酒器有M229出土的应事爵和应事觶，M242出土爵1件、觶2件，M210出土爵（明器）、觶（明器）各1件，M84出土爵、觶各1件，M85出土素面觶1件，M232出土觶或尊的残片，M231出土锡觶1件，M213出土锡爵、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214、215页。

^② 张懋镛：《试论商周青铜器的文化属性与器类演变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197~201页。

觶各1件，M86出土爵、觶的残片^①。由应事爵和应事觶的铭文可知是应国贵族的青铜器，其他酒器虽无铭文，但从锈色和器物风格来看，不好说是外来之器，大致也是应国青铜器。传世应国青铜器中还有两件应公觶，一件有鋳（《商周》010269）^②，一件或被称为尊（《商周》010269），其实还是觶。引人注目的是后一件应公觶腹部饰大兽面纹，其纹饰形态和布局都有浓郁的商器艺术风格。M242的年代大致在昭王时期，M229的年代已进入西周中期。爵与觶自西周早期晚段开始衰落，在周王畿地区的周人墓里已经很少见到爵和觶了，而在应国墓地还多次出现，考虑应国墓地被盗严重，实际上传统酒器数量还要多。例如，2008年苏富比春拍的一件应公方彝^③，做工精致，可能来自平顶山应国墓地。西周中期方彝很少，且制作一般，应公方彝便显得引人注目。这些都说明在酒礼器方面，应国受殷商文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④。

再看晋国。山西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资料至今没有详细公布，加之被盗严重，想对墓地的文化状态做一点研究是非常困难的。下面只是根据已公布的材料谈一点看法。M113和M114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组墓葬，在西周早中期之交，是最合适与其他三个诸侯国做比较的考古遗址，因为叶家山曾国墓地的下限在这个时期，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材料也主要在这个时期，是最能反映诸侯国文化差异的时期。M114乃晋侯墓，被盗严重，出土觶1件；M113为晋侯夫人墓，此墓未被盗，出土爵2件、觶3件、觚1件^⑤。按常理可推知M114出土的爵、觶、觚的数量应更多，种类也更多。中期偏晚的M33出土觶1件，晚期的M8、M62~M64、M91~M93、M102都出土有爵或爵、觶。M62、M63、M93、M102还出土了方彝^⑥。M63出土的云纹方彝（M63：76），盖体连铸，无底，显然是一件明器。M93出土的龙纹方彝（M93：51），装饰比上一件讲究多了，在盖顶捉手两侧各装饰一只蹲踞状的小熊，在器盖四侧分别装饰顾首卧龙和卧虎各两只，器身上亦装饰爬兽4只，从器盖到器身及四角装饰扉棱，盖、沿下饰波带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大象出版社，2012年，27、96、154~156、190、191、391、407、408、449、583、670页。

②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③ 李树浪：《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应国青铜器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

④ 张懋镛：《西周早中期应国青铜礼器中的商文化因素》，《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79~83页。

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12页。

⑥ M8、M13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4~6页。M31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22、33页。M62~M64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1~21页。M33、M91~M93、M102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4~38页。

状云纹，近圈足处饰斜角云纹，圈足上饰重鳞纹。方彝在西周中期之后已很少见，西周晚期的晋侯墓葬出土这样装饰讲究的方彝，可见在晋国社会上层，受殷商文化的影响可谓绵长。

由于尚未发现西周时期鲁侯的墓葬，所以很难与其他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做对比研究。迄今为止只见到一件鲁侯爵（《商周》08580），不知有觚、觶、罍、方彝否，所以鲁国在青铜器类方面所受殷商文化的影响难以判断。

最后谈曾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保存完整，使我们有可能对西周早期的曾国青铜器的类别特点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不少爵、觚、觶，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缀有族徽，显然是外来之器，部分可能是“分器”所得的器物^①，应剔除出去，以免影响我们的判断。曾经有人以叶家山墓地出土族徽青铜器多而否定墓地主人为姬姓贵族，显然是没有搞清楚它们的来源。

M1出土𠄎父乙爵1件（M1：010）、𠄎父癸觚2件（M1：013、M1：020）和冉父丁罍1件（M1：015），共4件^②。这4件器物属于“分器”的可能性很大。

M27出土𠄎父乙觚（M27：13）1件，觶4件：𠄎父癸觶、守父乙觶、冉觶、且南翟觶（有人将翟前二字释作“且南”，恐怕有问题，在早期金文中，通常人名之前是族徽，所以这也是一件有族徽的觶）^③。这4件觶尺寸、形制、纹饰、族徽各不相同，可见是临时拼凑的一套器物，不是曾侯自己的器物。有一件举觥壶也是外来之器。还有一件兽面纹觥，发掘者认为有较早的年代特征，很有道理^④。共7件。另外M27出土2件青铜爵（M27：5、M27：6），尺寸、形制、纹饰基本一致，无族徽，很可能是曾侯自己的器物。

M28出土𠄎父辛爵（M28：172）1件，另一件父辛爵（M28：171）与前者形态、风格接近，很可能是同时所铸。这两件爵年代较早。还有裴母辛觶（M28：168）1件^⑤。这几件器物属于“分器”的可能性很大。

M46出土鸟父丁爵2件（M46：13、M46：14）、亚𠄎父丙觶1件（M46：11）、𠄎


① 张懋镛：《西周早期铜器墓的分类与族属——兼论“分器”现象》，《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344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27～29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27～32页。

④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210页。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26、27页。

父乙尊（M46：16）、祖乙卣（M46：12）各1件^①。这几件器物的年代都比较早，属于“分器”的可能性很大。

M65出土弦纹爵2件（M65：33）、云雷纹觶1件（M65：159）^②。这3件器的年代也比较早。

M107出土夬◇父乙爵1件（M107：10）^③，觚（M107：11）1件，戈父乙尊（M107：8）、戈父乙卣（M107：7）各1件。这些器的年代大致在昭王前后，所以不属于前面所说的“分器”，可能是通过助祭、通婚等途径获得的。M107出土西宫爵1件（M107：12），显然是曾侯的器物，还有父辛觶（M107：9）1件，从组合关系的角度看，也有可能为曾侯所作。

M111出土觚形器1件（M111：123）^④，此器形制特殊，前所未见，又无族徽，装饰简单，与晚殷以来的觚有别，很可能是曾侯自作的器物。还有侯用彝罍（M111：111），上有铭文“侯用彝”，表明这是曾侯所用器。这些不是外来之器。

综上所述，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爵、觚、觶、罍等酒器不少，其中至少有6件是曾侯自作的器物。其中曾侯用罍的出现，引人注目，因为西周早期罍特别少，而且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件罍可以证明为姬周贵族所用。这些都表明曾国青铜器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可能比较大^⑤。

总而言之，在青铜酒器的使用方面，像应、晋、鲁、曾国这样远离西周王畿，靠近或者处于殷商文化氛围浓郁的地方的诸侯国，既不同于殷遗民对酒器的眷恋，也与西周王畿姬周贵族的态度有别。比较而言，在酒器方面所受殷商文化的影响，应、晋、曾三国为大，鲁国可能较小。

应、晋、鲁、曾四国青铜器不仅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周边土著文化的影响。

正如《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应国青铜器卷》指出的，应国部分青铜器受到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譬如，匍盃的形制与雁形近，明显是模仿水禽的造型，可能起源于地方青铜文化。M242出土的素面鼎（M242：13）很有特点，束颈、垂腹、细高足，这种薄壁细高足鼎不产于中原地区，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在南方地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47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21、22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13页。

④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112~146页。

⑤ 需要说明的是，叶家山有些资料没有发表或者不完整（如只有铭文拓片没有器形图），本文无法运用，故而会有议论不到的地方。

区流行。M85出土的蟠龙盖盃(M85:16),作为盖纽的蟠龙为高浮雕,与中原地区的蟠龙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不同。陈小三博士认为该器有典型的吴越风格特点^①。很有道理。M84出土的箍棱鼎(M84:74)的形制也很特别,做束颈、垂腹状,但与一般束颈垂腹鼎不同的是颈与腹交界处呈凸起状,形成一周箍棱,这种形制的鼎在中原地区罕见,应是受到长江中游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或许是应国位置偏南的原因受南方青铜文化影响比较深。

与应国相反,晋国地处北土,受北方、西北青铜文化的影响要大一些。晋侯墓地M113出土一件青铜三足瓮(M113:37),乃仿陶三足瓮而成,极为少见,年代在西周早期。而陶三足瓮可能来自更北的内蒙古(朱开沟遗址)或较近的东下冯遗址,通过女性婚嫁(M113是晋侯夫人墓),将这些异族的器物带进晋国。M113还出土一件青铜双耳罐(M113:125),年代应在西周早期。青铜罐很少见于西周墓葬中。双耳折肩罐为齐家文化陶器中的常见形制,而这件铜双耳罐与齐家文化秦魏家下层出土的陶双耳罐(M89:3)相似。这些器物出在晋侯夫人墓中,晋侯夫人很可能与羌人有关系,至少表明晋文化与西方、北方的戎狄文化有频繁交流^②。

西周时期鲁国的情况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到了春秋早期,鲁国故城墓葬出土的一些青铜器有地方特色,如M48出土的裸体人形三足盘,据方辉先生研究,这种以裸体人形作足的器物多出于海岱莒文化区,如小邾国墓地M3、滕州后荆沟M1、临朐泉头M甲、沂源姑子坪M1等墓葬,是海岱地区的特色器物,年代也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③。鲁国故城M48出土的裸体人形三足盘可能是受其影响下的产物。鲁国故城的两件卵形青铜壶(M30:32、M48:16)不见于中原及海岱境外的其他地区,但在鲁东南日照地区发现较多^④,年代也略早,应来自海岱东南一带或者是受其影响。

曾国青铜器也受到其他青铜文化的影响。典型例子是M111出土的青铜罍(M111:5)。正如发掘者所言:“器形、兽面纹、虎与鸟装饰与湖南邵东贺家村罍钟几乎相同。”^⑤是南方地区的产品。M1出土的兽面纹小鼎(M1:14),与天马一曲村晋国墓地M6081出土的2件南宫姬鼎有点相似。从M2出土的曾侯谏作媿甗、簋来看,M1出土的这件兽面纹小鼎的纹饰风格与曾侯方鼎有关联,它有可能借鉴了北方媿

① 陈小三:《平顶山应国墓地新见铜盃与吴越地区西周铜器断代》,《考古》2015年第5期。

② 陈芳妹:《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163页。

③ 齐皖(方辉):《山东省博物馆馆藏裸人铜方鼎》,《文物天地》1990年第5期。

④ 杨深富:《山东日照固崖出土一批铜器》,《考古》1984年第7期。

⑤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252、253页。

氏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①。

总而言之，在青铜器器类方面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应、晋、曾三国为大，鲁国可能较小。

三、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形式的差别

我们在《西周早期铜器墓的分类与族属——兼论“分器”现象》一文中，为判定西周早期墓葬的族属提出五点标准。其中第四点是：“凡是墓葬中酒器种类与数量超过食器，多使用青铜爵、觚、觶等饮酒器，这样的墓葬主人一般来说为商人，反之为周人。”^②换言之，哪个姬姓诸侯国的青铜器组合中酒器种类与数量接近食器，这个姬姓诸侯国的青铜器受殷商文化的影响就深，反之则浅。需要说明的是，酒器中如有明器，则要酌情考虑。

先看应国。很遗憾，平顶山应国墓地被盗严重，西周早中期器物组合完整的墓葬不多。M242出土鼎、簋、觶各2件，尊、卣、爵各1件。酒器数量（5件）多于饪食器（4件）数量，颇不寻常。在饪食器中至少有1件柞伯簋是外来之器。在5件酒器中，表面锈色与风格比较一致，也没有族徽，不像是外来之器，应是当时当地铸造。鉴于一般殷商青铜器墓中酒器数量多于饪食器的特点，说明M242在青铜器组合方面所受殷商文化的影响较大。

另一座墓葬是M229，器物组合是否完整，发掘者没有明确指出。年代应晚于M242，在昭穆之际。出土有鼎、簋、爵、觶各1件，酒器数量（2件）等于饪食器（2件）数量。这4件青铜器上都有器主的名字“应事”。尤其是应事爵，据报告说“器壁甚厚，做工精细”，且有铭文，显然它不是仓促制作的明器。锈色与风格比较一致，应是当时当地铸造。已经到昭穆之际了，此时爵、觶这样成组的酒器组合已经很少，而应事还在铸造爵、觶，可见墓主人更在乎酒器，在青铜器组合方面所受殷商文化更深。

M210出土青铜器6件：鼎、簋、尊、卣、爵、觶各1件，酒器数量（4件）大于饪食器（2件）数量。但尊、卣、爵、觶都是明器，其制作是为了体现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文化方面的意义要弱一些。

M84（应侯禹墓）出土青铜器10件：鼎2件，觚、盃、盘、盃、尊、卣、爵、觶各

^① 张懋镕：《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18页。

^② 张懋镕：《西周早期铜器墓的分类与族属——兼论“分器”现象》，《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348页。

1件。酒器数量（4件）等于饪食器（4件）数量^①。

从以上4座墓分析，出土酒器与食器数量非常接近，尤其是应侯冢墓年代已进入西周中期，仍然有较多的酒器，表明受殷商文化影响之深。

研究晋国青铜器组合的好材料是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年代较早的墓葬只有M113和M114，鉴于M114晋侯墓被盗严重，只能用M113晋侯夫人墓的资料。M113出土饪食器15件：鼎8、簋6、甗1，酒器12件：爵2、觶3、觚1、尊1、卣2、壶1、罐1、瓮1，饪食器数量大于酒器数量。较晚的资料有M91，出土饪食器17件：鼎7、簋5、鬲2、甗1、豆1、孟1，酒器6件：爵2、尊1、卣1、壶2，也是饪食器数量大于酒器数量。年代最晚的M93出土饪食器14件：鼎6、簋7、甗1，酒器7件：爵1、觶1、尊1、卣1、壶2、方彝1，饪食器数量大于酒器数量，而且酒器中除了壶都是明器^②。

鲁国比较特殊，其青铜器的组合形式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甲组墓为代表的、当地土著即东夷青铜器的组合形式：始终以卣为核心，每座青铜器墓至少有1件青铜卣随葬，大部分青铜器墓没有鼎，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簋制度在这里基本不存在。没有明器，多以实用器陪葬。二是以乙组墓为代表的、姬周贵族的青铜器组合形式：以鼎、簋组合为核心，卣少，有明器^③。这说明鲁国对境内的殷遗民或东夷土著并没有彻底推行“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的政策，姬姓鲁人与共居于鲁国都城的殷遗民或东夷土著保留了各自的风俗习惯^④。

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的资料比较丰富。其中M1出土饪食器13件：鼎8、簋2、甗1、鬲1、匕1，酒器10件：爵3、斝1、觚2、觶1、尊1、卣1、壘1，饪食器数量大于酒器数量。M2出土饪食器9件：鼎5、簋2、甗1、鬲1，无酒器。M3出土饪食器5件：鼎2、簋2、甗1，无酒器。M27出土饪食器12件：鼎5、簋4、甗1、鬲2，酒器13件：爵2、觚1、觶4、尊1、卣1、壘2、壶1、觥1，酒器数量大于饪食器数量。M28出土饪食器13件：鼎7、鬲1、甗1、簋4，酒器10件：尊2、卣2、爵2、觚1、觶1、壘1、壶1，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大象出版社，2012年，149、189、191、405~408、572~583页。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12页；M8、M13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4~6页。M31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22、33页。M62~M64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1~21页。M33、M91~M93、M102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4~38页。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107~109、145~152页。

④ 毕经纬：《鲁国铜礼器的初步整理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1期，91页。

饪食器数量大于酒器数量。M65出土饪食器13件：鼎7、簋4、甗1、鬲1，酒器6件：尊1、卣1、壶1、爵2、觶1，饪食器数量大于酒器数量。M107出土饪食器5件：鼎2、簋1、甗1、鬲1；酒器6件：尊1、卣1、爵2、觚1、觶1，饪食器数量小于酒器数量。总体来说，西周早期曾国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中食器数量大于酒器数量^①。

综上所述，除了鲁国情况不清楚之外，晋国和曾国基本奉行西周王畿地区实行的重食政策，应国稍差一些，究竟是重食还是重酒不明显，显然后者受殷商文化影响要大一些。

四、日名和族徽问题

20多年来我们相继发表了《周人不用日名说》《周人不用族徽说》《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三论“周人不用日名说”——兼答周言先生》《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考古学意义》《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的考古学证明》一系列文章，旨在说明商周时期周人基本不用日名，至于极少数姬周贵族偶尔使用日名，是缘于相互间的文化影响。“作为殷商时期非常重要的日名制度在周人身上竟没有打下任何印记，那反而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失去了历史的真实。”^②当然周人使用日名是有限定的时空范围的：①周人使用日名的时间很短，主要在成康时期，个别进入西周中期，如应事爵、觶，还有濂姬簋，但不会晚于穆王。②周人使用日名的层面很窄，主要是大贵族，如武王以及召公、曾侯。③周人使用日名的地域偏东，譬如应事爵、觶作为应国青铜器出在远离西周王畿、殷商文化氛围浓郁的河南地区，有利于证明这一点。

在应、晋、鲁、曾四国中，曾国使用日名的现象比较突出。M111出土的曾侯作父乙方鼎铭曰：“曾侯作父乙宝尊彝。”M1也出土了“师作父癸宝尊彝”铭文的方鼎，但不能确定其主人的身份。考虑到另外两位曾侯（M28、M65）的青铜器上并未出现日名，所以日名铜器所占的比例仍然比较低。

曾侯青铜器上不但有日名，还有族徽。譬如，M27出土的伯生盃（M27：15），铭文曰：“白（伯）生作彝。曾。”作为国名的曾字缀在铭文末尾，与商代青铜器上族徽的位置一致，考虑西周早期族徽文字已经开始衰落，所以曾国青铜器上的所谓族徽已经丧失了意义，只是一种模仿而已，当然这种模仿还是折射出殷商文化的影响。

其次是应国。M229的应事爵、觶铭文相同：“应事作父乙宝。”作为贵族，应事使用日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应事并非姬姓，与应公、应侯不属于同一家族。另一

① 张懋镕：《叶家山墓地出土非主流青铜礼容器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曾国青铜器卷》（代序），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② 张懋镕：《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25页。

种可能是应事与应公、应侯属于同一家族，那就意味应国贵族也使用日名。《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一文，介绍墓中出土的1件应公鼎，其铭曰：“应公作尊彝簠鼎，武帝日丁子子子孙孙永宝。”^①铭文中的“武帝”就是周武王，日丁是武王的庙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邰、晋、应、韩，武之穆也。”应公一支以武王为其始祖，似乎应国也用日名。但在其他应公、应侯青铜器上并没有日名，M8出土应公鼎上有日名只是对周初应国祖先偶用日名的一种追述。如此来说，应国使用日名的比例也很低。

迄今在晋国和鲁国青铜器未见缀有日名，说明在日名制度方面，晋国和鲁国所受殷商文化影响小于曾国和应国。

五、结 语

以上我们从青铜器出土环境的差异、青铜器类别的差异、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形式的差别、日名和族徽问题四个方面对应、晋、鲁、曾四个诸侯国的青铜器进行了考察。在墓葬的形制和葬式方面，曾国所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其次是晋国，再次是应国，最后是鲁国。在酒器方面所受殷商文化的影响，应、晋、曾三国为大，鲁国较小。青铜器类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应、晋、曾三国为大，鲁国较小。青铜器组合形式方面，除了鲁国情况不清楚之外，晋国和曾国实行重食政策，应国稍差一些，似乎酒、食并重。在使用日名方面，晋国和鲁国所受殷商文化影响小于曾国和应国。综合分析，四个诸侯国所受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影响程度，以曾国为最，应国和晋国次之，鲁国可能最小。从中可见，鲁国最为纯正，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并非夸大之词。

造成以上态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原本周承殷制，西周姬姓诸侯国受到殷商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从地域角度来看，同为姬姓诸侯国，由于居处的方位不同，所受到的殷商文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曾国所在的江汉流域，虽然离殷都安阳遥远，但往昔毕竟是商人长期经略的南土，弥漫着浓郁的殷商文化气息。^②应国虽然与曾国相比离周王畿要近一点，但处在河南的中部偏南，这里的殷商文化氛围不弱，应国受到的影响自然大一点。

还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鲁国距离周王畿虽然遥远，但曲阜一带殷商文化的影响并不大，反而是东夷文化有实力。毕竟周礼对鲁国的影响太大，东夷文化对鲁国似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② 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13~17页。